

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论略

王峰¹ 刘伟^{2,3}

(1. 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2.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3. 吉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8)

摘要: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应用翻译提供了广阔空间,方梦之以此为契机创立“应用翻译研究”。他的“一体三环”译学体系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本文受到他的“一分为三”理论的启发,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论述了他的应用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筹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著书立说方面总结了他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建立和发展付出的努力,阐释了应用翻译研究顺应数字时代发展所肇画的蓝图。

关键词:应用翻译研究;“一体三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6-0101-09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发展迅速,从实践到理论再到人才队伍,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领域的开辟和发展离不开众多学者的付出和努力。其中,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奠基人和领航者,他的贡献当首屈一指。纵观其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应用翻译研究根植于翻译实践。

方梦之大学毕业于1958年,他主修俄语,兼修德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出于对语言知识的热爱,他利用业余时间学外语,将俄语、德语和英语等外语知识付诸科技翻译实践。1964年,他调入江苏冶金研究所情报室从事专职的科技情报翻译和编辑工作。他“由单纯的翻译实践走向了国外科技信息开发,由科技翻译而转为科技型专家翻译”(黄忠廉等,2014:70)。丰富的多语种翻译实践经验一方面成为他翻译理论萌发的土壤,另一方面也确保他的理论研究并非囿于汉英互译,而是有可能适用更大范围内的多语互译。

方梦之从事应用翻译的理论研究始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的教学科研。1978年,他调入上海工业大学,角色的转变促使他对应用翻译的研究逐渐由实践转向理论,他1979年便开始撰写论文。他重视科技文体研究,1985年着手撰写首部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历时四载,于1989年出版。彼时恰逢国家大量引入国外的科技著作,亟需相关理论指导科技英语教学和翻译实践。该

收稿日期:2023-01-08

基金项目:山东省泰山学者专家计划(202211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王峰,男,山东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料库翻译学、《西游记》翻译研究。

刘伟,男,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吉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批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

引用格式:王峰,刘伟.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论略[J].外国语文,2023(6):101-109.

著作一经问世便受到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和杨自俭等业内人士及读者的广泛好评,成为当时科技英语教学与翻译的必读著作,也奠定了方梦之在科技翻译领域的学术基础(刘金龙,2012)。对于科技翻译而言,叙事学和文体学不仅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解构和阐释意义的工具(杨志亭,2023:137)。

1 应用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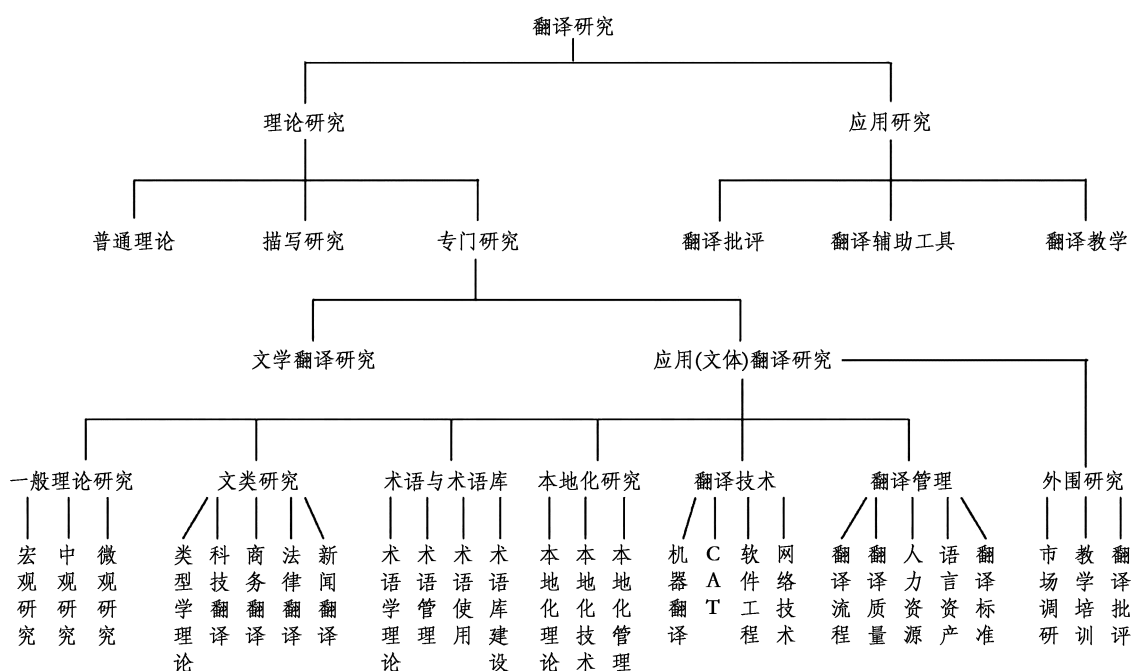
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者有了学科体系自信,著书立说,“XX 翻译学”“翻译 XX 学”等著作相继涌现,多达 70 余种,但有些论著仍存在着理论适用性较差、系统性缺乏、实践性阙略等问题(方梦之等,2020)。判断上述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更新翻译的认知或者解决新的研究问题”(穆雷等,2020:124)。那么,方梦之为何不用“应用翻译学”这个术语?“应用翻译研究”又是否名副其实呢?首先,“应用翻译学”容易产生歧义,既可以是各种“翻译学”的应用(应用+翻译学),也可以是“应用翻译”这种特殊文体类型的理论研究(应用翻译+学)。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研究”并非附和某一翻译理论,而是建构应用文体翻译的理论系统(方梦之,2013:83-84),属于“应用翻译+学”,故而称之“应用翻译研究”。我们从术语命名也能看出方梦之的谦虚学风。第二,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建设较为完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这个角度说,应用翻译研究名副其实(表 1)。汉语语境中的“应用翻译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的特有产物,与中西翻译研究传统中的相关概念有较大不同。

表 1 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应用翻译研究本体论	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包括应用翻译的概念、性质、特征、研究范围等	方梦之(2011c/2013) 界定应用翻译研究的定义、内涵、研究范围
应用翻译研究认识论	对研究问题的认知过程与反映机制,着重解决翻译中认知与实践的问题	方梦之(2011c/2013) 综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分析和德国功能学派的文本类型等方法制定翻译策略;提出变译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方梦之等,2020)
应用翻译研究方法论	研究的思路、途径、方式、程序	方梦之(2013) 提出翻译策略的理据、要素与特征

1.1 应用翻译研究本体论

应用翻译研究并非空中楼阁,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根基是方梦之始终重视的文体研究。受语域理论启发,他认为科学有理论和应用之分,文本亦可分为纯理论文本和应用理论文本,因此把“纯理论文本排除在应用翻译之外”(方梦之,2003:48),采用“应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的概念,并在内涵上予以丰富。“‘应用翻译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与‘文学翻译’相对,学科上与‘应用翻译+学’范畴相应。”(黄忠廉,2013:94)在《译学词典》中,他将应用翻译研究的本质定义为“主要研究如何把普通译学和特殊译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的编纂和机器翻译等,从微观上对翻译的目的、功能、标准、程序和方法等问题,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以使普通译学理论和特殊译学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检验”(方梦之,2004:54)。这与霍尔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的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有所区别。



霍氏应用翻译是与纯翻译相对的领域,研究范围是翻译教学、翻译工具和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应用,而方梦之应用翻译的研究对象为应用本体各要素及其间的关系、应用翻译的策略和技巧,目的在于提出应用翻译的理论,属于理论性研究(方梦之,2013)。同时,也许囿于霍尔姆斯诗人和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他并没有给予应用翻译应有的地位。方梦之(2014)对霍氏的图谱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将纯翻译研究和描写翻译研究合并为理论(theoretical)研究与应用(applied)研究。修改后的翻译研究框架见图1(方梦之,2014:2)。

方梦之修改后的翻译研究框架意义在于:纠正了“应用翻译不值得研究”的传统偏见,规划了应用翻译研究的本体疆域,厘清了应用翻译的理论审视维度。方梦之认为“译学体系繁杂,但环环相扣、纵横相通,本体与外围学科交叉、照应。时间是催化剂,相邻学科的发展是翻译研究的助推剂,译学本体之外遂有外围学科的三环,形成‘一体三环’”(方梦之等,2020:1)。“一体”即译学本体,“三环”则分别对应着20世纪50至90年代国内译学发展过程中与其相近、相关和交叉的学科研究及翻译文化和技术研究。“一环”为相近的语言学研究;“二环”为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论及符号学等研究;“三环”为翻译文化和技术研究。该体系层次分明,清晰地反映出国内译学发展的脉络,同时与方梦之的学术经历有所契合,“既是其学术实践的总结,又是他建构应用翻译理论的制高点”(黄忠廉等,2014:70),也恰好描绘了目前国内外翻译学的发展轨迹,从内环向外环扩展式推进,同时反哺“一体”发展:认知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翻译技术研究是时下最为热门的三个翻译研究领域(王峰等,2017),但是译学本体始终扮演“债务人”的角色,向其他学科、理论借用理论工具,而不是“债权人”,为其他学科、理论提供理论工具。“一体三环”体系不仅对翻译学的发展提出期望,也为应用翻译研究规划了发展轨迹。

方梦之将应用翻译研究划分为六个基本范畴: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分类研究、术语研究、翻译的本地化与全球化。前三项为“体”,后几项被认为是应用翻译实践中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方梦之,2013)。宏观研究为其中的灵魂,研究内容为翻译的主客体关系、客观世界、评价体系

及基本范畴关系。中观研究则关于具体的方案、策略、模式和框架,上承宏观研究,并以其为基础和依据,下启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即在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技巧和方法。三者“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吸纳和整合各种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于一体,并构成了应用翻译的本体研究”(刘金龙,2012:5)。三者相辅相成,构成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的完整体系。

1.2 应用翻译研究认识论

翻译的目的是翻译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尽管国内外译界对此莫衷一是,但大多认为翻译的目的为双语概念、形式、形象、文化等层面的意义对应转换(刘宓庆,2019)。本文聚焦最能体现应用翻译交流意图的语义观和语境观,阐释应用翻译研究的认识论。

1.2.1 语义观:概念意义、形式意义、形象意义、文化意义

概念意义再现是跨语转换的首要任务,也是区分“译”与“非译”的关键。不同于文学翻译的概念意义,方梦之(2013)认为应用翻译中的概念主要表达方式是术语,而术语在特定的领域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和译法,因此他对概念意义在应用翻译中的重视程度从其术语翻译的研究中可窥一斑。在早期论文中,方梦之(1981/1983)就对科技文本词汇中的概念和术语的意义和翻译进行过研究。在《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和技巧》(2013)中,他将术语研究置于应用翻译研究的范围,用一章的篇幅从术语与概念、术语的定名原则、术语化和术语的翻译等角度对术语亦即概念的意义和翻译技巧进行了论述。术语翻译要与专业语境结合。例如,在“The red cross has begun major cloning project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pigs for organ donors”中,“organ donors”不能译成“器官捐献者”,因为这是人的行为,句中的pigs是实验对象,因此应该译成“器官供体”才符合专业语境。同时,方梦之(2022)结合《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编撰经验,对“直译”“重译”等译学术语的“一词双义”现象进行论述。

形式意义指的是词、句、篇章等结构在形式上的特征。文学文本的各种修辞格、诗歌和押韵等方式都具有形式意义。尽管应用文本的形式在意义转换过程中不能引起概念意义的差别,但仍不能忽视。以合同翻译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叠用为例,方梦之(2013)认为英文商务合同文本中词汇叠用的形式多于汉语,例如,“negligence, fault, or failure in the duties and obligations”(未履行责任和义务)、“be null and void and of no effect”(作废并无效)、“void and voidable”(无效的和可以撤销的)等叠用词的使用是为了使意思更为完整、准确,从而保证不被曲解。

形象意义研究的是修辞比喻意义,即从字面意义到比喻意义的发展和转移,其目的是达到形象化。因此,形象意义往往出现在广告、旅游指南等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文本中。以广告文本为例,为了唤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广告文本的设计者在修辞和风格上更重视形象意义。方梦之(2013)认为巧用修辞格是广告文本的一大特点,隐喻、拟人、夸张、押韵等修辞手段常见于广告文本中,翻译时应采用直译、意译、活译等方法。例如,将百事可乐的广告“Pepsi-Cola hits the spot, Twelve full ounces, that a lot, Twice as much for a nickel, too, Pepsi-Cola is the drink for you”译成“百事可乐味道好,足足12盎司量不少,五分硬币买24盎司,百事可乐供您享”,既保持了原文中的押韵修辞格,又通俗易懂。

文化意义是指“语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刘宓庆,2019:4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也是一种文化信息符号系统,因此,文化意义必然会参与到意义转换中。文化意义在旅游文本中经常出现,因为旅游文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普通游客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知识”(方梦之,2005:274)。因此,文本翻译必须重视文化信息符号

的语际转换,以适应不同语言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例如,将梁祝的故事转译为中国的 *Romeo and Juliet*,能够使英语国家的人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故事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义对于应用翻译(实践)并非等量齐观,方梦之解决意义优先次序的方案是文本类型考察。显然这一理念与德国功能目的学派的“功能文本类型”认识论不谋而合。方梦之对按功能进行文本类型分类的认识意义和理论价值予以认可,但他认为此种文本间的区别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此外,应用翻译解决意义对等优先次序还要参考语境文化、文本正式程度和专业内容等方面(方梦之,2013)。应用文本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选用适当的策略进行翻译,从而达成文本的意义表征和跨文化传播。

1.2.2 语境观: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

如上所述,方梦之看待翻译等值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传统的意义对等上,而是把眼光放在体现应用翻译之“用”的语境关系对等上。应用翻译更要服务读者需求,而文学作品可以偏向作者,不考虑读者接受能力;应用翻译注重译后效果,而文学作品更注重诗学效果,不是考虑社会影响与效用。因此,语境对于应用翻译制约效果更强。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的语境观体现了“一分为三”的认识论,他将应用翻译研究的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语言语境指词、短语、句子在语篇中前后相关的内容;情景语境指与交际有关的人物、场合和时间;文化语境指语言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经济、宗教、习俗和政治背景。”(方梦之,2013:178)

方梦之(2013)认为应用翻译的选词受到语境的制约。语言语境影响词的搭配、词性、数及普通名词与抽象名词的词义转变等方面。就文化语境而言,他认为应用翻译中对词的正确理解和翻译不能脱离文化。而情景语境可以从语域特征和情景特征两方面影响应用翻译中的词义选择。语域方面,不同语域中词的意义可能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语域不同的门类中词义也有区别;情景方面,应用文本的交际主题、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目的,即语场、语式、语旨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译者对词义的确立。

1.3 方法论

1.3.1 重描写,建立中国特色的功能主义翻译观

方梦之十分重视对应用文本语篇特点的描写。在《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方梦之,2005)、《科技翻译教程》(方梦之等,2015)、《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方梦之,2011b)和《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和技巧》(方梦之,2013)等著作中,他都对科技、经贸、法律、新闻、广告等应用文体的语言、功能、行文及语义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并将应用文本的整体语篇特点归纳为信息性、劝导性、匿名性和时效性。针对以上特点,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翻译“达旨、循规、共喻”的原则。

“达旨”既是对严复翻译思想和实践的借鉴,也反映了方梦之功能主义的翻译观。他的“达旨”观念借鉴了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中的合理成分,与其不同的是,他认为如今翻译中的“达旨”应该是达“翻译委托人和译本接收者的旨”(方梦之,2013:72),而在应用翻译中,无论是信息型文本还是以功能呼唤为主的文本,翻译都不应重原文的语言形式而轻意义和精神。因此,“坚持达旨的原则乃至译者之根本”(方梦之,2013:73)。

“循规”受到来自图里、赫曼斯等翻译文化学派学者们的启示,遵循的是文化规范。广义上讲,翻译法令、标准、规则等都是译者应该遵守的规范。在应用翻译中,译语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规

范制度等尤要注意,因为这些问题不可能只靠语言本身的规则予以解决。

“共喻”是在完成“达旨”和“循规”后,译文需要最终实现的目标,以为归根到底应该服务于译语读者。方梦之(2013)认为译文通顺是“共喻”的一般标准,而变译则是实现该标准的主要策略;适应不同读者需求是“共喻”的另一种体现,针对不同读者群体采用不同文体是解决这一目标的途径,例如同一科技内容的翻译既可以用科普性表述也可以用专业性表述。

可见,“达旨”是应用翻译的起点,“循规”是保证,“共喻”则是归宿,三者共为一体,互相作用,成为指导应用翻译的重要原则。

1.3.2 重对策,强调翻译理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在方梦之倡导下,《上海科技翻译》(《上海翻译》的前身)在 2003 年发起了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大辩论,有效地深化了学界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翻译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但并不是所有的翻译理论以指导实践为归旨,而实践性则是应用翻译理论的应有之义。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实践,而落脚点则是对策,其中包括理论观念、策略手段和翻译技巧等(方梦之,2013:67),对应翻译理论的宏观、中观、微观三分体系,应用翻译研究的翻译对策研究已经不是孤立地探讨翻译技巧,而是通达贯穿了整体翻译体系,包括宏观翻译思想理念、中观翻译策略系统、微观翻译技巧方法。

作为应用翻译的一般理论研究,该体系既能解决应用翻译意义和形式的转换规律、翻译的程序、方法,也能关注应用翻译的可译性、语际交流功能和社会效用,其指导价值也在方梦之的应用翻译实践中得以验证。例如,方梦之早年从事的科技翻译通常仅需要汲取重要的科技、学术、新闻等方面的信息而非全部资料,针对此种情况,“变译”顺理成章地成为最佳策略。此种策略能够为读者提供简洁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同时节省时间,符合社会需求(方梦之,2023:86)。因此,在应用翻译实践中运用变译理论便是重视翻译理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体现。

1.3.3 重语际对比研究,总结汉英双语转换规律

尽管英汉对比的重要性很早就得到了翻译理论研究者的重视,但是视界和深度都有待开拓(刘必庆,2019:7)。语际对比是方梦之发展应用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之一,他以科技文本为例对比了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等特点,提出“系统的对比研究对语言教学、翻译以及本国语的探讨都有积极作用”(方梦之,1983:4),在其后的论著中也不乏语际对比的研究。方梦之(2013)从语义、语用和语法三个维度对比了应用文本翻译中汉英语言的特点(表 2)。

表 2 应用文本中汉英语言三维对比

对比维度	对比方式	对应用翻译研究的影响
语义维度	对比汉英两种语言语义的转换生成过程,借助交际语法中的意义层次论述翻译过程话语信息的传递	影响双语转换过程中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
语用维度	对比语言文化、思维和语言转化方面的差异及这些差异所引起的句子结构重心、信息重心、含蓄程度、语言逻辑等方面的不同	影响翻译信息表达的准确性
语法维度	对比主语与主题、形合与意合、树状与竹状及静态与动态等四个较为基础方面的汉英语言结构	影响译文的规范、合理

2 学科发展规划

方梦之数十年来致力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开拓,带领一众研究者创办刊物、著书立说、发表论文

并筹办会议,以实际行动积极促进应用翻译发展。

2.1 创办刊物

改革开放之初,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各行业加大了科技引入力度,应科技翻译之需,《科技英语学习》(现为《当代外语研究》)、《上海科技翻译》(现为《上海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等三家以科技英语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得以创办。其中,由方梦之担任主编的《上海科技翻译》成为推动应用翻译发展中坚力量和主要平台。

《上海科技翻译》宗旨是:探讨翻译理论,传播译事知识;总结翻译经验,促进翻译教学;切磋方法技巧,广纳微言精理;侧重应用文体,推动翻译事业。20世纪90年代,科技翻译发展式微,商务翻译、旅游翻译、广告翻译、法律翻译等逐渐兴起,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呈百花齐放之势。此时,科技之名已不能完全涵盖研究所需,2005年刊物更名为《上海翻译》。尽管刊物更名,但是不变的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宗旨。30多年来,该刊物发文近3,000篇,无疑是应用翻译研究的瞭望塔和风向标,并于2015年出版了由方梦之主编的应用翻译——《〈上海(科技)翻译〉30年(1986—2015)论文集》,反映和记录应用翻译发展的历程。他除了主编《上海翻译》之外,也积极推动另两本刊物的发展,为应用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2.2 著书立说

1985年,方梦之由文体学入手,历时四载完成了他的首部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在应用翻译研究仍处在重实践的时代,此专著如迎春之花率先绽放,在当时堪称一时无两,受到了学界和译界广泛关注和认可。此后,他相继出版了多部应用翻译研究领域的专著和教材,如《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1998)、《翻译新论与实践》(1999/2002)、《实用文本汉译英》(2003,合著)、《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2004)、《英汉翻译基础教程》(2005)、《英汉-汉英应用翻译综合教程》(2008)、《科技翻译教程》(2008)、《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2013)等不一而足。

同时,方梦之在辞书编纂领域也堪称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出于担任《上海科技翻译》主编的工作需要,他对编纂译学辞典产生了学术兴趣(连玉乐等,2018)。多年来,他共主编和参与译学辞书七部,其中主编五部,分别为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家辞典《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1991)、《新编科技英汉辞典》(1995)、《译学辞典》(2004)、《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和《翻译学辞典》(2019),占据我国译学辞书的半壁江山。他将“一体三环”的译学思想融入辞书编纂中,极大地推动了应用翻译(术语及术语库)研究乃至译学的整体发展。

2.3 筹办学术会议

方梦之不仅著作等身,也十分重视与业内人士之间的学术交流,并积极支持本土译学理论发展。2003年,在他的倡导和策划下,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被喻为应用翻译研究的里程碑。

3 新时代应用翻译的增长点

新形势下,语言服务、国际传播的发展与提升契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要求,回应了新形势下诸多关键性问题。方梦之(2013)认为应用翻译依托的翻译市场仍有不完善之处,与其相关联的翻译本地化、翻译技术和翻译项目管理等方面尤需加强,也是新时代应用翻译的增长点。

本地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本地化作为本地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主要业务为网

站、软件、游戏和课件的本地化,由此可见本地化翻译的实质为应用翻译。方梦之(2013)比较了本地化与传统翻译的联系与差异,指出翻译是本地化的一部分,一般由处理软件开始,除了保证正确外还要符合本地市场的传统与风俗,遵守国际规则,同时,报价方式和客户群体也不相同,因此,本地化与传统的翻译不同。而我国翻译行业的本地化就是汉化,使国外产品符合我国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方梦之,2014)。但是由于本地化研究的时间尚短,其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发展空间很大,从而使其成为应用翻译新的增长点。

翻译产业化对翻译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现代化翻译技术成为译者尤其是应用文本译者的必备技能,因此,“对于应用翻译研究和实践来说,翻译技术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方梦之,2014:5)。方梦之(2014)回顾了翻译技术的研究历程,总结了目前计算机辅助和机器翻译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的应用方式及语音识别、大数据和云技术等新技术对翻译的影响,同时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翻译技术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有待加强。

翻译项目管理也是翻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结果,是翻译企业按照客户要求在保证翻译质量和企业利润的前提下,为理顺翻译项目各环节,对翻译项目进行的管理。方梦之(2014)认为,尽管翻译项目管理包含多种因素,但是保证翻译产品质量的关键要素为质量管理、时间控制和成本管理,另外,相关行业和客户企业的标准也是翻译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现代应用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4 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应用翻译研究恰逢其时。方梦之作为该领域的领航者,致力于应用翻译研究50余载,为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建立和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榜样。他重视应用翻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他对应用翻译的定义、内涵、研究范围方面研究均有别于霍尔姆斯理论,他综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分析和德国功能学派的文本类型等方法制定了应用翻译研究的翻译策略,肯定变译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并提出应用翻译研究重描写、重对策、重语际对比的翻译策略理据、要素与特征。同时,他筹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地为应用翻译研究的建立和发展指引方向,擘画蓝图。因此,本文对方梦之在应用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所做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进行了综述,期待未来该领域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 方梦之. 1981. 略论科技英语的词义特点[J]. 外语学刊(3): 40-42+84.
- 方梦之. 1983. 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引伸[J]. 中国翻译(3): 28-30.
- 方梦之. 2003. 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200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侧记[J]. 中国翻译(6): 47-49.
- 方梦之. 2004.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 2005. 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 2011a. 应用文体翻译研究的定位与范畴[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95-99.
- 方梦之. 2011b. 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 方梦之. 2011c.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 2013.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 2014. 应用(文体)翻译学的内部体系[J]. 上海翻译(2): 1-6.
- 方梦之. 2022. 译学术语中的同名异义[J]. 外语与翻译(2): 1-4+98.
- 方梦之. 2023. 跨学科创学之成败得失——66种跨学科的翻译学鸟瞰[J]. 外国语(2): 79-87.
- 方梦之, 范武邱. 2015. 科技翻译教程. 第2版[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 孙吉娟. 2020. 翻译研究的“宏中微”三分[J]. 上海翻译(1): 1-7+94.
- 方梦之, 王志娟. 2020. 变译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J]. 外语教学(1): 82-86.
- 黄忠廉. 2013. 应用翻译学名实探[J]. 中国外语(4): 93-98.
- 黄忠廉, 孙秋花, 李亚舒. 2014. 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形成考[J]. 上海翻译(4): 70-72.
- 连玉乐, 方梦之. 2018. 新编译学辞典 追踪译学发展——方梦之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外语研究(1): 108-113+119.
- 刘金龙. 2012. 应用翻译: 教学与研究——方梦之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2): 3-8.
- 刘宓庆. 2019.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 穆雷, 杨扬. 2020.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之路径[J]. 外国语文(6): 118-125.
- 王峰, 陈文. 2017. 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译学核心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J]. 外语教学(4): 83-88.
- 杨志亭. 2023. 叙事文体学视阈下科技翻译中的叙事重构[J]. 外国语文(4): 131-137.

Toward a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Fang Mengzhi's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es

WANG Feng LIU We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have cross-ferti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Fang Mengzhi, as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establishing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against this social backdrop. The framework “One Body with Three Rings” proposed by Fang serves as a cardinal underpinning for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his tripartite methodology, del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concerns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regarding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oreover, it seek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his efforts in consolidating and advancing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st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editing scholarly journals, and publishing academic works.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expounds upon Fang's visionary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Body with Three Rings”;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龙丹